

“金融危机”与中国——网络文章选编

目录

1. 岑科：中国离金融危机有多远.....	2
2. 警惕国际资本在华制造金融危机.....	4
3. 警惕外资蚕食中国经济主导权.....	5
4. 上海证券报：揭开美国经济五个谎言 中国人应当心.....	7
5. 警惕和正视中国当前面临的金融战争.....	9
6. 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	12
7. 中国要警惕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	17
8.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金融危机已无法避免！.....	18
9. 中国金融开放：承诺的积极开放，没承诺的也在开放.....	18
10. 越南惊变：新亚洲金融危机最后警告.....	19
11. 警惕 2007 热钱：为 2008 年酝酿新亚洲金融风暴？.....	20
12. 惊叹：皇甫平（周瑞金）不幸言中——越南已经走到中国前面去了.....	22
13. 将钱存外银？全面开放金融？卖光国资？看阿根廷的教训！.....	24
14. 从巴西、阿根廷、韩国看外资控制本国银行的后果.....	25

1. 岑科：中国离金融危机有多远

时间：2006年08月02日08:01 我来说两句(20)

<http://business.sohu.com/20060802/n244573373.shtml>

【来源：新青年-权衡】

回顾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反观中国，情景竟如此相似

来源：《新青年·权衡》杂志 作者：岑科

2001年底，阿根廷受经济衰退及财政形势恶化的影响，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发生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事件。政府随即发布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的政策。但却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引爆了蓄势已久的社会矛盾，导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骚乱、游行示威和流血事件。阿根廷十数天内更换了三位总统，整个社会陷入经济恶化、政治混乱和动荡不安。

往前追溯，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金融震荡，影响波及到遥远的巴西；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1994年至1995年，金融危机的狂飙席卷了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战争、洪水、疾病等传统灾害正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机却仍然威胁着我们的生活。

现代传媒把金融危机的灾难活生生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在墨西哥，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在印尼，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的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在阿根廷，饥饿的市民被迫以抛尸街头的死马为食？

所有这些，似乎离中国人很远，又似乎很近。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类似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危机发生前，一直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享有“亚洲奇迹”的赞誉。反观中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也被称为一枝独秀，但多年来沉淀的银行不良贷款已是广为人知。此时此刻，回顾其他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检视自身遭遇危机的可能与风险，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金融危机被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纵观所有的金融危机，几乎都包括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存款人和投资人信心丧失，同时要求从银行提款，造成银行偿付能力和资金流动的困难；二是由于银行资金紧缩，对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与下滑。

“挤兑”是金融危机的核心环节和主要特征。在现代经济中，银行通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即银行吸收存款后，大部分贷出，只留小部分供储户提取。这一机制为企业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金融恐慌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款人同时提款，银行就一定会倒闭。

但挤兑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一般情况下，储户不可能同时向银行提款，这也是部分准备金制得以实行的原因。在特殊情况下，储户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某些重大事件或消息的刺激下，产生恐慌，竞相到银行提款，就会造成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要考察，在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是哪些因素潜在地增加了储户挤提存款的可能，哪些因素降低了银行抵御挤兑的能力。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几次主要金融危机的回顾，可以发现，几乎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和原因，在其错综复杂的因素中也包含着诸多共同之处。但显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哪些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资本市场不发达，风险向银行集中

上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吸引外资，90年代达到高潮。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缺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来看，银行具有内在风险性。前面说过，在现代经济中，银行通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即银行吸收存款后，大部分贷出，只留小部分供储户提取。这一机制为金融恐慌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款人同时提款，银行就一定会倒闭。1931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几乎一半的美国银行破产——其中大部分是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设立之初就存在功能偏差和制度性缺陷，由此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低下和股市规模发展缓慢。例如2003年，我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85%，而同期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5340亿元，占融资总量的15%，其中通过股票和企业债形式的融资不到5%。可见，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严重失衡，风险大部分集中在银行。这一点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非常相似，甚至更为突出。

银行体制扭曲，产生大量坏帐

银行状况在金融危机形成和对实质经济的影响上首当其冲。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往往导致银行盲目贷款，以及银行与公司的过度噬合，以至银行和公司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降低。这在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表现得最为典型。

上世纪90年代，韩国金泳三政府大力推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与财阀、银行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扶植大企业集团，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扭曲。

韩国政府规定：私人和私人机构不得单独拥有一家银行4%以上的股份；所有银行的行长、经理都必须由政府任命；银行的财权和人事权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员和财阀在幕后决定贷款的去向。政府不仅控制信贷的流向和利率，也控制贷款的期限和种类。银行成为政府下属的一个财务部门，基本上没有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能力和权限。

这种指令性贷款为坏帐大量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大企业和银行实现优惠的保护措施，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发挥作用，审查不严格，导致企业过度借债。例如1996年，韩国上市公司负债金额比1995年增加20.3%，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84.1%。与此同时，大部分韩国企业资本效率低下。在发生危机的前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由此，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11家主要银行的坏帐率占放款额度的14.3%，其中以大企业的坏帐居多。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出现财政危机，银行会很快获知信息，并及时处理。但在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掩盖起来。由于大企业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一旦破产势必引起社会震荡。再加上企业、银行和政府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韩国政府对银行坏帐的真相拼命掩盖，能拖就拖。

韩国的大企业为了扭转困境，进一步投资于那些收益高但风险也大的项目。银行明明知道这些项目风险很大，但如果不支持这些项目，企业就永远不可能归还贷款。于是银行只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银行系统的坏帐窟窿也越来越大。这种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企业与银行的双重扭曲，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中国金融系统中银行坏帐的产生与韩国如出一辙。坏帐产生后，政府对坏帐的处理也让人不甚了了。在1999年中国金融部门独创“剥离”坏帐的处理方式之后，国有银行的坏帐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剥离出去的坏帐能收回多少？不能收回的坏帐怎么办？今后产生的坏帐是否还要通过剥离的方式消除？都是大大的疑问。

政府开支过大，内外债务缠身

在过去发生的数次金融危机中，巨额的外债负担是一个共同特征。各国危机爆发之前，都有一个持续的、数额巨大的外债形成过程。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以美元计算的1年期以内的国外银行债务，占泰国GDP的45%、印度尼西亚GDP的35%以及韩国GDP的25%。

拉美国家更是以债务问题闻名于世。以阿根廷为例，自1983年结束军人专制、恢复民主政治后，曾多次推动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但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阿根廷的问题在，政治选举中，各政党为赢得选票纷纷许诺，诸如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工作机会，等等。但提高社会福利需要钱，增加工作机会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员——1991至1999年，仅首都布伊诺斯艾利斯，政府工作人员从28万增加到40万——结果政府开支及财政赤字直线上升。1999年，阿根廷政府开支达到GDP的28.2%，2001年估计达到GDP的1/3。

1991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对付财政赤字的办法是对内“曲线借债”，即通过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通胀率最高时达到每年5000%。1991年，阿根廷进行货币改革，将本币与美元挂钩，防止政府滥印钞票。在这以后，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只能向国外借债。但由于担心阿根廷的偿还能力，国外金融机构在借出大量贷款后，不愿继续贷款。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山穷水尽，宣布停止偿还本息，金融危机随即爆发。

对于中国来说，外债负担和财政赤字尚未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政府开支扩大、公务员工资不断上涨的趋势正在加剧。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一片大好，掩盖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隐性政府债务（如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应该引起警惕。一旦政府债务问题集中爆发，除了开动印钞机，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赖帐”，别

无它法。

对外开放不慎，改革次序颠倒

在总结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几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列为重要原因。直观地看，确实如此。例如，1996年，后来发生金融危机的5个亚洲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进一出相差约780亿美元，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可想而知。

但进一步看，笼统地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资本自由流动是没有意义的。正如银行必须保障储户的提款自由，但所有人同时提款就会导致银行倒闭一样；当发生银行挤兑时，我们应该去寻找发生挤兑的原因，而不是把银行倒闭作为质疑提款自由的依据。

通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向金融市场化迈进的过程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二是资本帐户对外资开放；三是货币价格（汇率）的自由浮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当，就会增加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泰国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1991年，泰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实现资本帐户开放。但在那时，泰国金融市场的“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政治关系在创立金融企业和安排银行贷款时影响至深。这使得金融资源的使用往往脱离合理的审查与监督。

另一方面，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泰国并没有放开汇率管制。它实行一种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固定汇率制，即央行通过买卖外汇，调节外汇供求，保持汇率不变。这种制度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当时，大量外资流入泰国，为了维持汇率不变，泰国政府增加泰铢的供应，用泰铢买入日元或美元等外汇。其结果，增加的泰铢通过银行体系，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1993年至1996年，泰国的外汇储备从25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住房贷款总额从4700亿泰铢增加到7900亿泰铢；房地产价格上涨了近400%，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泰国经济当局曾经试图阻止泡沫膨胀。他们在买入外汇的时候，增加泰铢供应，然后通过出售债券买回等量的泰铢，即所谓的“对冲”政策。但这种政策拉高了当地的利率，对海外资金产生了更大吸引力。结果，更多的外资涌入，经济泡沫继续膨胀，直到最后迸裂，引发金融危机。

现在来看泰国的教训，它应该在金融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监管；至少应该在资本帐户对外开放的同时，放弃固定汇率。但这一教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直到今天，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对外开放市场，同时放松资本帐户流动，但坚守汇率不变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前景已经写在泰国金融危机的故事中。

审视中国经济，房地产泡沫和政策调控困境已经隐约可见。能否避免金融危机的到来，正是对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者的严峻考验。

作者系《新青年·权衡》杂志编辑

更多内容见 www.quanheng.cn

2. 警惕国际资本在华制造金融危机

作者：◎章玉贵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再次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情势下，转移经济风险，已是美国在经济日渐失衡的既有约束框架下，继续保持其国际金融竞争中优势地位的最优策略。而其极为倚重的推手就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国际资本。目前，国际资本可能正在试图通过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来延缓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漏洞也为国际资本在华制造金融危机提供了可能条件。尽管普遍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体系自1997年以来取得最明显的进步是初步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系统性风险过高问题；二是金融机构出资人制度改革问题。但现在看来，上述两大问题依然未得到根本解决。而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渐次开放以及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近年来热钱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直接助推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又加大国际资本投机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其直接表现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迫使人民

币发行投放市场量的增大。受此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一直保持高位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带动了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与物价逐步上涨。而当热钱获利回吐并重创本土投资者的信心之后，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又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在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同时，又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股市暴跌。

另一方面，国内目前的金融政策正在逐步强化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无风险套利机制，并允许外资在此机制下自由流动，寻求套利空间。随着外资不断涌入及成效不彰的金融产品创新，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势必加剧生产领域中货币紧缩和流通领域中货币过剩的流动性二元化现象。而金融调控的空间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冲销成本的日益增加、资产价格的膨胀和巨额热钱流入等已经显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风险。显见，国际过剩投机资本大量流入我国，既是规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也是对人民币套汇套利的驱动。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和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则从汇率和热钱问题中衍生出来，倘若没有金融资本市场锐意进取和创新成功，则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剧增。

而若中国爆发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导致经济低迷5至10年。A股的深幅下挫，负面影响已经相当明显：权重股成为重灾区，太保、中煤能源、中石油等权重股相继破发，带动个股全线普跌，使中国经济最具价值部分的定价权易手外资掌握。而如果股市继续下挫甚至崩塌，势必严重影响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因为市场跌入熊市以后，资金将回流银行，而银行股在股价指数中权重巨大，一旦银行股的收益受到储蓄回流的影响，必将进一步拖累股市，股市将陷入持续下跌的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过多的银行资金会诱发大量放款冲动，从而出现严重的信贷风险。进一步地，随着银行坏账可能进一步增多，爆发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果真如此，中国经济将会像十年前的东南亚国家那样为之付出5至10年的低迷代价。

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金融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国在审慎开放金融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事实上，透过新兴市场金融开放的实践过程和亚洲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金融调整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比金融创新更重要。

要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亟需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3. 警惕外资蚕食中国经济主导权

<http://www.jsmedia.tv/bbs/viewthread.php?tid=8758&statsdata=41||11782>

作者：章玉贵来源：证券时报 <http://www.p5w.net/p5w/home/stime/today/index.html> 发布时间：2008年04月09日 05:51 （作者系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

进入2008年，中国正在经受一场基于既有经济秩序而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干扰：某种意义上被外资和买办挟持的中国股市，在使投资者享受了一段时间的“财富幻觉”之后迅即“高台跳水”，市场一片哀鸿。而被美元绑架的人民币持续被动升值，已经使得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断打折；另一方面，美国放任美元贬值又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一个月之内就蒸发了300多亿美元；毫无国际投资经验的中投公司在美国市场“不幸落水”。残酷的现实表明，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产业控制权的争夺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能掌握重要产业的经济主导权，即使制造能力再强也无法摆脱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边缘化地位。而透过对中国在实体产业和金融产业的竞争现状分析，我们不禁不为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风险所担心。

中国失去对部分产业控制权

近年来，随着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的持续增加，不少西方人把“世界工厂”的高帽戴在了中国的头上。但我们更应透过中国经济舞台的热闹场面看到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虚弱。随着FDI的不断增加，外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也节节攀升，其中不少已经处于垄断地位。

从产业控制理论来看，外资和东道国对产业的控制是一种“零和博弈”，一国的产业安全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决过程。而在这种“零和博弈”下，中国重要产业的发展现状是：不少支柱产业的控制权已不

在中国企业手里。如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外资的渗透力已经非常绵密，国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几乎都有外资背景。外资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汽车业的命脉；在信息通信领域，微软、英特尔、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跨国巨头通过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兴建研发中心，既夺市场又抢人才，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产业领域，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其主要设备与技术大多依赖进口。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有为母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一面，从产业安全着想，关键产业不能过分依赖外资。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不少中国支柱产业，由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若遇到本土投资成本上升或国内市场饱和，投资回收，国际产业资本就可能衰退或再转移。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而且由于没有积累起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中国极有可能面临“产业空洞化”风险。另一方面，过于依赖技术转移又削弱了中国本土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

因此，当外资日渐渗透到中国重要产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时，在中国的产业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今天，如果中国的本土产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不能占据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则中国的本土产业只能沦落到低质高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中，就意味着有可能永远受制于人。

外资蚕食中国金融主导权

在中国的实体产业面临边缘化的危险同时，中国的金融业的现状更加令人忧心。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已经是和平年代国家经济安全的头等大事。事实上，看看拉美经济的一蹶不振，看看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杀伤力就知道金融安全之于主权国家是何等重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金融安全的意义尤显重要。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中，真正独立于美元、欧元和日元体系的只有中国。但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大国是不愿看到中国迅速拥有足以与它们抗衡的强大经济实力的。在他们看来，中国金融实力的崛起就意味着西方世界金融霸主地位的削弱，意味着中国进入原来由它们控制的势力范围。尤其是美国最不能容忍的是不遵守它制定的或不和它玩同一游戏规则的国家 and 势力。而对于那些做梦也想分肥乃至操控中国市场的国际金融资本来说，击败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控制中国证券市场，夺取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导权是它们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国际金融资本近年来显著加快了控制中国金融主导权的步伐。它们通过操纵美元贬值，并经由政治施压，迫使人民币朝着它们所预设的路径升值；另一方面，引导国际热钱通过合法与地下两条渠道进入中国，在中国股市最低点时大举入市，抄了中国股市的大底，从而获取了A股有史以来最大的“制度红利”，随后包括高盛、大摩等华尔街各大投行，包括罗杰斯和格林斯潘又不约而同地唱空中国股市。而当上证指数果真在短短5个月之内就从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高点几乎腰斩，市场一片哀鸿之时，汇丰银行和摩根大通等近日却又联手唱多，认为中国政府必定会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公布一连串救市措施，A股市场将于二季度末出现反弹。这种左手唱空，右手收购，左手唱多拉高，右手出货暴赚的伎俩其实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但国际金融资本对话语权的操纵总是让中国投资者甚至管理层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着他们起舞，上了他们的圈套。即将推出的A股股指期货，可能又将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控制中国金融主导权的新战场。

当然，从目前的情势看，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布局尚处于前期阶段，短期内中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从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诸多动作来看，它们要搞垮中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不能在这场金融主导权争夺战中取胜，其后果将比日本“失去的10年”更为严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要防止当年日元被美国绑架下所演绎的悲剧在中国发生”的告诫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强国之路必多坎坷

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那些掌控世界经济和金融大权的国家来说，后起者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要遭到它们及其代理人的打压。而透过外资对中国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并不能掩盖我们在实体经济领域里的竞争力虚弱，意欲成为新兴金融大国的中国正在遭受国际金融资本的竭力阻遏。因此，我们在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征途中，既要看重中国基于经济实力持续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中国成为一流经济强国的约束条件；并做好应对不断出现的基于既有经济秩序而生的诸多压力和干扰的各项准备。同时，还应善用优势，锻造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并利用业已形成的经济影响力、市场优势和国家智慧来破除外力阻遏，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唯有如此，才能镜鉴他国教训，求解制胜之道。

4. 上海证券报：揭开美国经济五个谎言 中国人应当心

[真话无敌] 于2008-05-12 19:31:25 上帖 [发短信] [表状]

<http://bookmark.people.com.cn/toViewBookmark.do?id=67738>

曾几何时，我们把美国视为政治与经济的完美的天堂；曾几何时，我们相信美国、相信美元；曾几何时，我们把辛勤创造的产品，我们的劳动和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向美国。而《美元大崩溃》一书应当让我们梦醒蓝桥了。

这本写于2006年底的书有很强的预见性，它所谈到的事情现在都发生了。这本书是美国的魔咒。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不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会变成自身的魔咒了。

很多美国人出的书，我们当从反面来看，但这本书可以从正面来看，因为它是从更多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利益进行的考察。

例如它用来警示国外央行的论述：

外国央行之所以投资外国资产，与他们非理性的机械的官僚主义有关，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私人投资者已经谨慎地离开了美国市场。但对于华尔街及其媒体来说，“资本盈余”显然是他们最看重的护身符，因为贸易赤字一旦转化为市场悲观主义，那么，他们将必死无疑。

且不管这句话的科学性如何，也不管中国有没有这种机械的官僚主义。但是，这一段话对于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量的海外金融机构投资而言，应当引起高度的警觉。不然我们将承受难以承受之重，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揭开美国经济的谎言

本书集中分析了美国经济的四个谎言：对外贸易、GDP、核心CPI、消费者信心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关于GDP的诺言，作者说，“真正创造财富的那一部分(如制造业和矿业)在GDP中的比例正在不断萎缩。在美国的GDP中，有超过70%来自消费，而这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崩溃，因为支撑消费的是庞大的外债，而不是国内的生产。”即使30%的生产也来自于实体经济的虚拟化的部分。很多高技术和服务业的收入具有很大的不可持续性。

美国的核心CPI，书中写到“美国对通胀的考核主要以核心CPI为依据，核心PPI和CPI掩盖了真实的通胀。核心通货膨胀一般用实际通货膨胀指标扣除一些价格容易波动的项目来衡量，扣除项目通常包括食品、能源、间接税、住房抵押贷款成本等，最常见的是食品和能源。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石油价格的上涨已经影响到其他价格，但并没有反映到核心数据中。……所以，美国的通胀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不包括上涨部分的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国际大玩笑了。为什么美国要自欺欺人呢？一是为了对国内选举有好处，二是欺骗外国的持有美元的央行和投资者，欺骗全世界仍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国家和个人。

关于对外贸易的谎言，作者讲了一个史密斯一家和陈老陈一家的故事：

史密斯一家人都失去了工作。为了维持先前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借钱度日。这样史密斯一家就会陷入债务的泥潭。显然，这种生活状态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们找到足够偿还债务，并可以维持先前生活方式的工作为止，否则，他们便将一直在这种痛苦中挣扎。

而与之相对应，另一个家庭——姑且称之为老陈一家——他们一家人非常勤劳，也非常节俭，平时不舍得花一分钱，以便有更多的积蓄。在这个积累阶段，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生活远不如其挥金如土的邻居，就是平时以借债和抵押为生的史密斯一家。在普通观察者眼中-他们仅仅基于两家人的消费模式来看问题-史密斯一家显然更为富裕。然而透过表面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老陈一家通目前的节俭最终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史密斯一家这种短视的挥霍是以牺牲未来生活方式为代价的。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美国与中国两个不同的家庭模式。作者的意图是想说明靠外债拥有别人的产品没有好的结果，美国正在挥霍未来，中国将拥有更好的未来。

然而，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接下来的事就是老陈家应当特别当心的了：

一种假设是史密斯一家能发行一种货币，而且这种货币老陈家必须接受，那么，老陈家将永远为史密斯一家服务。

第二种假设是史密斯一家虽然负债，但他们有大房子和各种有价值的资产，接着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胀，老陈家的钱变得一文不值，那么，最终的穷人还是老陈家。

第三种情况是发生了一个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的国际货币安排，只有史密斯发行的货币可以升值，老陈也很惨。

第四种情况，发生了战争，史密斯一家占领了老陈一家，老陈家就会成为奴隶了。

这四种假设都有可能发生，也是中国政府和家庭应当特别当心的了。也许美国下面就会唱这些戏。这个故事也揭露了美国的第五个谎言：消费者信心创造经济发展。因为这种信心是政府的误导，也是一种不合理的货币制度的流氓结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超级原子弹？

美元贬值的速度近期如脱缰野马。中国是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全球已知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有约65%是美元。中国虽未公布官方的外汇储备比例，但应远高于全球平均值。有分析认为，如假定中国外储90%是美元，过去一个月即蒸发357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一个月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

5年前，斯蒂格利茨发表了《对全球化的抗议及金融援助的内幕——抗议全球化的目的是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从国际金融组织给国际金融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不公平因素、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等方面对国际货币金融机构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我想说，有趣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的项目都是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个机构却由发达工业国家控制。有人对联合国只有五个国家具有否决权的事实表示不满，而IMF只有一个美国决策者。想想也就明白了，IMF基础结构改革将会多么很难，像中国这样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国家为获得其否决权不知还要有怎样艰巨的努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建主要归功于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他最初的目标是非常好的，但善花未必结出的都是善果。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的初衷是想开发原子能以解决人类资源的不足，但美国人却用它造成了原子弹，偷偷地扔到日本人家的后院屠杀了好多无辜的人；凯恩斯提倡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也是好心好意地想让全球的金融体系更加稳定，但正这个体制为美国人制造了威力更大的核武——超级经济原子弹。二次大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让美国人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侵略，无偿地占有了全球各国的资源，就连凯恩斯的母国英国也未能幸免。

美元的血泪账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这一制度没有决定如果美元不能兑换黄金以后如何处罚的条款，这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埋下了70年的祸根。

我们至今都不会明白，非洲、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为什么有长期的贫困和动荡，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对全世界进行掠夺。美国欠下全世界人民上百万亿的债务，这种债务是由于货币发行权形成的。不仅如此，美国在经济困难时期，不断用通货膨胀剥夺全世界人民。

本书写到：“与其他货币相比，在2002-2004年间，美元已经贬值24%，而2005年股市的技术性调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2006年的美元继续衰退，3月中旬至5月中旬又贬值了12%。”现在看来，到2008年这段时间内美元又大幅度贬值，这使得全世界用美元储备的国家受到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同时这也是美国化解全球债务危机的重要方式。贬值以后我们应当引起认真的反省。

通过本书作者讲的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清美元的本质是什么：

假设有6个落难者困在一个岛上，其中有5个亚洲人，1个美国人。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饥饿。所以他们一起商量以后，做了以下的分工：5个亚洲人中，1个人负责狩猎，1个人负责捕鱼，1个人负责采集野菜，1个人负责做饭，1个人负责拾柴和照看火，而第六个人，也就是那个美国人负责吃饭。

5个亚洲人每天都处于忙碌之中，以便为这个漫步沙滩的美国人提供食物。这个美国人就好比是日光沙龙的老板，但只有一个顾客，那就是他自己。一天结束以后，5个亚洲人就把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交给这个美国人。

现在的美国人是现实的，他知道要继续享用他们所提供的盛宴，那么他们也必须吃饭，于是，他就给这些亚洲人留下一些残羹剩饭，以便他们维持第二天的劳动。

在现代经济学家眼中，这个美国人便成了岛上经济发展的唯一推动力。如果没有这个美国人及其永不满足的胃口，那么这个岛上的所有亚洲人都会失业。

而事实上，这个美国人并非是这个岛上经济的引擎。对于这些亚洲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投票将这个美国人驱逐出岛。没有美国人，他们就可以分得更多的食物。

为什么5个亚洲人要为美国人劳动，就是因为货币制度，5个亚洲人想得到他们公认的美元财富。

这个故事从一个美国人的口中说出，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当前货币制度的可悲之处，关键是我们很多人还不明白这种血迹斑斑的事实。现在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人通过通货膨胀对全球掠夺以后，他们以及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又会制造一个新的什么体系，这应当被制止。

谁也阻挡不了“科学发展”的中国

经济学是有本位主义的。因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理论，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效用，而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的效用是不一样的。他们或多或少地代表本国的利益。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的引进国外经济学家的理论，而要设法使它们中国化。

在本书中，作者不断批评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推崇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和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对于当前的美国情况来讲显然是有道理的。

有一个重要事实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值得认真反思，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使我们怀疑，西方主流经济学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如果说他们解释了经济现实，他们对西方世界这种多年潜伏的危机没有足够的总结，如果说他们能预测未来，但是他们做得比本书的作者差得很远。

中国的崛起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并用以指导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我觉得，中国建立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的机会已经成熟。谁也阻挡不了“科学发展”的中国。

5. 警惕和正视中国当前面临的金融战争

钱学宁教授

一、剖析美国发动的金融战争

去年到今年，可谓是世界经济与金融的多事之秋，先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接连上扬，再是次级债引发美国房地产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全球，而后世界粮价也随之暴涨。如今这三大因素形成谐振，相互刺激，从虚拟经济蔓延实体经济，全球经济处在风雨飘摇中，全球金融市场哀鸿遍野。

究其根源，这还是美国多年来“金融战争”战略的延续和深化。简言之，1944年布雷登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经济强势下的货币强势基础，使美元初步成为了实质上的纸黄金，变成世界贸易阶段和外汇储备的绝对主要币种。1971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黄金挂钩机制，而此时美元的地位已然确立，美联储实际上控制着全球货币的主要发行权，没有了黄金对应储备，发行基础只好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国力信用上。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变动美元发行状况，放松或紧缩全球各经济体的银根，一方面通过无成本资本输出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则通过敏感地攻击资本流入国的货币，使外债依赖型经济体还贷成本迅速上升，摧毁其经济。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拉美外债上升到很高幅度时，美国立即实行强势美元政策，拉美国外债成本骤升，国内经济发展无以为继，走向崩溃；当美国发现强势美元政策导致对日、对德逆差巨大，日德经济高速发展，危及其在国际上的经济利益时，美国主导下的“广场协议”也就应运而生了，日本出口型经济遭受重挫，疲软之下的企业高负债也就理所当然地拖垮了银行，日本经济陷入衰退。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更是登峰造极，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民众数十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成果。由于美元的强势和世界结算与储备支配地位，加上首屈一指的国力，“美元”加“大棒”策略屡屡得逞。布雷登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受美国指导，形同虚设，出炉的经济挽救措施不外乎收缩银根、开放金融经济，便于美国在一片废墟中掠夺金子和财富。

与此同时，美元泛滥和金融创新使得国际游资的数量急剧攀升，控制了全球的商品与金融期货市场、金融资本市场，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游资美其名曰“对冲基金”，在虚拟经济市场上呼风唤雨，密切配合美元政策，充当美国侵袭其他国家经济体的刽子手。攻击英镑、亚洲金融危机，都闪现这些游资团队的身影，与美国政治政策和美元战略充分合作，攫取世界财富。具体事例不再赘述。

大家知道，期货产生的初衷是发现价格、套期保值，这项金融创新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初中期，大家都以实体经济为根本的情况下，期货市场中的价格发现功能表现良好，引导经济投资与贸易，规避原料或产成品的价格风险，功不可没。但是事情的发展脱离了初创者的良好愿望。到中后期，投机加剧、游资暴增使得商品与金融期货市场的交易以数千数万倍剧增，实体经济的套期保值者比例几可忽略不计，庞大的游资博弈控制了市场，而后，实体经济的交易价格则变化为按照期货市场结算价进行交易，因果倒置，虚拟的期货市场就此控制实体经济交易价格。也就是说，围绕着美元政策的国际游资团队实质上控制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命脉。

根据上述的美元逻辑，再回头看现今的全球经济风波，美元用心昭然若揭。21世纪初，美国困扰于财政、国际收支双赤字的迷局，也就是说，美国对全球其他经济体负债累累，大家手中储备的美元以及美国长期国债实质上是美国的两种借据，美国必须承受沉重的还款压力。为了减轻压力，美元的贬值是势所必然的美式选择。美国国内经济由于高科技泡沫的破裂，后续热点无以为继。而后，美国为了刺激国内经济，提供次级贷款工具，以房地产业延续繁荣，并以资产证券化为通道，把次级债风险初步转嫁到欧洲金融机构。当房地产也陷入僵局时，美元的弱势政策也就愈演愈烈，为了增加国内金融业的流动性，扩张刺激国内企业，美联储不停减息，从5.5%一路降至2%，从利息至汇率双重损害国际美元持有者的利益，是一种活生生的以邻为壑的美国利益至上战略。

细究美国的自身经济，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产业结构或发展问题，除了房地产价格稍高引发次债危机（占美国国内信用总额并不高，而且很多损失已经转嫁国外）外，其他产业健康度尚可。问题在于：美国必须解决双赤字问题，理论解决方法不外乎缩减财政开支、制约过度消费，使国家、民众储蓄率提高，这都会在短期内对美国产业与福利造成影响。美国处在产业周期的困顿期，而继续原来的赤字政策也将内外交困。而此时，以“四大金砖”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蒸蒸日上，在国际上对美国利益和地位造成巨大冲击。焦急中的美国理所当然地想到了美元系统对策。

首先是绑架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往上走，通过嫁祸于“四大金砖”的发展需求，利用游资不停喧涨石油、铜、铁矿石价格，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负担。美国是个发达国家，除了石油外，其它对外依赖度不强，价格变动的经济敏感度不高，况且自身的石油储备丰富，对其冲击远逊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受害者典型。中国从投资到消费在原材料和能源上都是高度对外依赖，产业发展的基础建立在高消耗上，大宗商品价格升高无疑使中国额外付出巨大的成本开支。其他国家亦然。大家可以观察数据，其实，仅从供需角度看价格，供需差异变动并不大，而且这十年来美国原油消费进口增长率远大于中国，从需求角度把价格上涨归咎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游资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上为实体交易定价，功不可没。

其次，美国在对美元实行贬值政策的同时，逼迫相关经济体货币升值，并开放金融市场，与当年的“广场协议”如出一辙。一是通过逼迫升值，压迫该国的外向型主导行业，击垮某些领域经济，二是通过美元贬值，贬低美元债务价格，减轻压力。另外，通过渗透目标国的金融市场，寻求操纵线路，美国金融机构伙同国际游资逐步进入该国金融机构或市场，一方面通过参股得到庞大的资本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国内业务迅速摸清该国产业状况、发展方向、承受能力，为今后的打击与收购奠定基础。

第三，美国通过“生物燃料”战略，打破国际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借强势脱逃全球稳定责任，配合原材料价格上涨引发的粮食成本上升，借助游资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拉升价格，渲染危机，冲击粮食资源配置，使粮食进口依赖型国家濒临崩溃边缘。

第四，美国在进行金融侵略时的重要手段是借着自有化、全球化名义，逼迫或诱惑目标国开放市场、开放金融，取消保护主义，让一个弱者完整地暴露在强者的攻击和掠夺之下，最后依靠所谓的经济援助和产业进入扶植，用美元和股权控制该经济体，达到其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两年来的世界危机表现其中相关度很高，主线就是美元的弱势政策，美元贬值与金融侵略是主线，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是顺手牵羊的副线，两方面相辅相成，互为动因，美元的贬值不停推升商品期货价格（因为美元是国际商品期货的报价币种），美国自身又通过渲染美国困境借口弱化美元。这样，美国在脱逃自身债务的同时又陷其它相关国家于困境，并在国际舆论上还嫁祸于发展中经济体。这就是美国的金融战争的思路和手段，各个局部战术完美地组合成了美国利益战略。

二、金融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在这场金融战争中，中国无疑是短期受害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高消耗型、高外向依赖性，各种弱点无一不在这次美元攻击的视野下。原材料、能源价格上升给产业造成很大困扰，人民币上涨大幅削减了出口外向型企业的利润空间，中国企业承受成本上升、汇兑损失的两大夹层压力，日子艰难，自身调节难度加大，企业与社会成本都很高。WTO协定下的金融开放条款为外国金融资本的渗透提供了渠道，虽然资本项下未开放，但是游资的进入方式和数量都已经对国内金融经济政策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外资在中国的金融股权收益已是盆满钵满，国外银行在国内的业务已然广泛涉足，投资银行业和金融咨询业配合进行经济观察与收购整合，一条针对中国产业实体的掠夺、加工成套流水线隐隐然呈现雏形。

中国为了冲销外汇储备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姑且这么定义），不停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以期压缩货币需求，压缩通货膨胀，动机无可非议，但是路径实属缘木求鱼。首先，本次通货膨胀并不是国内需求的突

发旺盛或是国内经济供给陷入短缺，而是国际美元弱化、游资推动引发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暴涨，从成本角度输入中国的通货膨胀。国内的人民币供给增加并不对实体经济商品需求造成价格冲击，所以，国内紧缩政策在诊断病因逻辑上并不成立。宏观调控开出的货币政策紧缩药方，却是对国内虚弱（并不健康）经济体的饥饿疗法。首先分析一下利率政策，由于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形成过热和过冷双向偏差的二元经济。由于过热行业的当前利润空间高，对利率的提升引发的筹资成本提高对其制约力度不大；然而，一些应当重点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负债率相对高，利润也极不稳定，利率提升对之造成的压力立竿见影，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创业型企业感受筹资能力下降，筹资成本上升。所以，利率政策对经济结构的微观调节作用适得其反，有点“亲者痛，仇者快”的味道。

再分析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效应。不容置疑，提高准备金率是对冲外汇占款引发的货币供给增加，通过抑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达到收缩货币供给的目的。从贸易项下真实顺差看，这个措施是完全合理正确的，但是，不可否认最近热钱涌入中国加剧，此部分资金转化为人民币停留在中国国内银行的存款账户上。这部分流动性基本不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不追逐生产资料也不消费，一般是伺机进入金融投机市场或是房地产市场，保持高流动性。既然是针对稳定CPI的对冲，央行在冲销时，必须按照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量来衡量冲销力度，保证企业正常的可贷性增长，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价格上涨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额外需求。否则，光从总量上简单制约货币供给，必然造成实体金融过度紧缩，国内企业在原料、汇率双重压力下还遭受流动性危机，经济滑坡势所必然，危在旦夕。

美国的金融资本在虎视眈眈。现在，一方面游资进入国内在等待，数量逐步增大，作为资本项目开放的先锋部队，正在熟悉摸索中国的产业状况与价值，悠哉游哉等待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逐步陷入困境，压缩产能，自贬价值，资产价格（楼市、股市）大幅下滑，往崩盘谷底滑落，国内实体经济的投资商经营环境急速恶化，经济实体价值迅速缩水。应当警惕：一只肥羊正慢慢牵近虎口。在合适时机，潜伏于国内的游资将逐步购买便宜的国内资源与资产，完成它们的战略收购计划，正如历次的美元升值引发的国家经济危机一样，美国与国际游资将一石二鸟，甚至名利双收。此番危局如不在战略角度进行反击，仍然缘木求鱼，中国经济势必危殆。中国多年的成果将不可避免被国际金融资本吞噬。

中国在此轮危机中不可说机会不好。中国多年的改革症结已经暴露在手术台聚光灯下，已然开始进行麻醉消毒工作。一是中国产业的高能耗主旋律在变调，在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企的情况下，三高企业受抑制，绿色能源、替代能源在发展，产业结构将主动向健康方向调整；二是长期向国外输送福利的外向型企业受到抑制，或是改向内需主导型产业方向，或是增强国际议价能力，增加国内利益；三是长期三农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为农民创收带来增长，农业投入主动性增强，为农业集约化经营提供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失衡问题。这些都是内外力作用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但是，在借势调整或调节的同时，必须好好手术治疗，并且关门养病，适当通风，徐徐温补。断不可急于求成，好坏器官一刀切，更不可贱卖健康器官。这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中国经济宏观格局也将进入健康态势。

三、中国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美国国家金融战略的透析，以及对中国现有对策的分析，笔者以为，必须充分认识国际金融战争的掠夺性和隐蔽性，立足中国长期利益和短期关注，培植强大的宏观战略思维和微观战术策略，抵御这场不见血的金融侵略战争。

首先，一定要为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保证适当宽松的金融宏观环境，增强企业发展需要的流动性，使金融的资金优化投向功能得到良性发挥，逐步引导产业向良态结构调整，改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货币政策调控，转向二元经济适调手段，比如对过热产业的立项审查控制、信贷窗口指导，对高科技、服务业等进行财政税收政策扶持、信贷重点支持，抑制过热行业，培植新兴行业。只要对产业政策进行有力调控，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可以相对宽松。

其次，正确引导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协调投入与供给，协调流动机制，保证农民的收益落实，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能，使三农问题进入良型循环解决轨道。在国际粮价失衡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正确对待，稳定供需，使农业环境不受国际游资绑架和冲击。

再次，金融保护与开放步骤必须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现在的侵略与掠夺已然不是领土的侵占和流血的杀戮，而是金融资产的占有与划拨和虚拟经济的定价权的争夺，关注和限定游资的流入是重中之重。中国最好的企业基本都已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所以，保证国内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中国优质资产的应有市场定价，是具备战略意义的，相对中国的GDP增长率，以及中国的潜在经济发展能力，现有的中国资产价格无疑是很低

的。同时，一个相对繁荣的证券市场有助于激发财富效应，稳定并助长国内的消费提升，调衡“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牵引均衡度。

这样，中国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局中才会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依靠外力，协调内力，逐步调整理顺经济格局，使国家经济走向健康、安全、高效。也只有这样，美国的金融战略才不会在中国得逞，中国才不致陷入国际危机的陷阱中，才不致成为金融战争的牺牲品。相反，在国际局势的制衡与力量涨落中，在这次危机的洗礼下，中国国内政经将更加健康，中国也将以蓬勃的新生政治经济形象取得更好的国际空间和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摘要]：

美国多年来实行“金融战争”战略。布雷登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经济强势下的货币强势基础，美国通过变动美元发行状况，放松或紧缩全球各经济体的银根，一方面通过无成本资本输出获利，另一方面通过敏感地攻击资本流入国的货币，迅速提升外债依赖型经济体还贷成本，摧毁其经济。同时，美元泛滥和金融创新使国际游资剧增，“对冲基金”在虚拟经济市场上密切配合美元政策，攻击英镑、掀起亚洲金融危机，围绕着美元政策的国际游资团队实质上控制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命脉。美国在一片废墟中掠夺金子和财富。

21世纪初，为解决美国经济困扰，推行“弱势美元政策”。从利息至汇率双重损害国际美元持有者的利益。美元贬值与金融侵略是主线，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是副线，两方面相辅相成，互为动因。美元贬值不停推升商品期货价格，通过渲染美国困境借口弱化美元，美国在脱逃自身债务的同时陷其它相关国家于困境，并在国际舆论上嫁祸于发展中经济体。这就是美国的金融战争的思路和手段，各个局部战术组合成了美国利益战略。

在这场金融战争中，中国无疑是短期受害者。高消耗型、高外向依赖性的中国经济承受成本上升、汇兑损失的两大压力；WTO协定下的金融开放条款为外国金融资本的渗透提供了渠道，游资的进入方式和数量对国内金融经济政策造成了威胁；国际美元弱化、游资推动引发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暴涨，形成成本输入型通货膨胀，国内紧缩政策并非对症下药；紧缩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方法对国内经济结构不均衡下的过热和过冷双向偏差的二元经济的微观调节作用适得其反；国际游资的流动性也纳入对冲外汇占款的紧缩范畴。国内企业在原料、汇率双重压力下还遭受流动性危机。中国的企业逐步陷入困境，压缩产能，自贬价值，潜伏于国内的游资将逐步购买便宜的国内资源与资产，完成它们的战略收购计划。

中国在此轮危机中的机会：一是高能耗主旋律在变调，三高企业受抑制，绿色能源、替代能源在发展；二是长期向国外输送福利的外向型企业受到抑制，或是改向内需主导方向，或是增强国际议价能力；三是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使农业投入主动性增强，为农业集约化经营提供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失衡问题。

中国对策：充分认识国际金融战争的掠夺性和隐蔽性，立足中国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关注，培植强大的宏观战略思维和微观战术策略，抵御这场不见血的金融侵略战争。首先要为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保证适当宽松的金融宏观环境，宏观货币政策调控，转向二元经济适调手段。其次，正确引导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稳定供需，使农业环境不受国际游资绑架和冲击。再次，金融保护与开放步骤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关注和限定游资的流入是重中之重。保证国内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中国优质资产的应有市场定价，财富效应，稳定并助长国内的消费提升，调衡“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牵引均衡度。

6. 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

张宏良教授 2008-04-01 22:22:17

在《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中我们指出，台湾322公投、拉萨暴乱、抵制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手段，目的是控制中国金融，让中国为西方信用危机买单。现在第一单已经下来了，中国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该决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分期意义的里程碑式文件，是中国将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主导权的历史性标志。西方国家终于在满足中国人奥运梦想之前，率先满足了控股中国银行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梦想。面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们不禁泪如雨下，中国输了！1840年以来一代接一代人的流血牺牲、一代又一代人

的艰苦奋斗，终究还是没有跳出西方列强的魔掌，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夹着皮包又回来了，并且比当初逃跑前回来的更加风光，成为了可以控股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的总老板。

从去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国企业完全开放，到现在中国银监会发文取消限制，期间仅仅6个月时间，贯彻落实美国决议的效率之高，恐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2个国家的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分治的决议，一个是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目前，关于伊拉克决议的落实还没个影子，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变成了现实。两个决议实施的不同结果，证明了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卓有成效的：用“美国鹦鹉”代替巡航导弹，更加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声明，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要从以军事打击和情报渗透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美国鹦鹉）为主，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就是21世纪美国鹦鹉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胜利。

去年9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为当年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定下目标，就是要求中国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的持股限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控股中国银行来弥补次贷危机的损失。这一点从当时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的讲话中反映的十分清楚，他告诉人们，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中国建设银行30亿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国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普莱斯的讲话人让所有美国人都激动不已，仅仅参股中国银行2年就有高达10余倍的惊人回报，如果直接控股中国银行，回报该是何等辉煌，恐怕将会达到百倍千倍！又一个新大陆展现在面前，面对这有史以来的最大金矿，盎格鲁“撒克逊人”激动的浑身发抖，国会迅速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罕见结果通过了要求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

决议通过的当天，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率领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飞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细并做好周密安排后，9月9日奔赴北京。飞机一落地，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便如同水银泻地般四散开来，按照各自专长和人脉关系，分别赴向商务部、银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委，赴向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国有金融机构高层，以及部分最高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和重点高校，游说中国彻底打开金融国门。华尔街游说团的游说，如同一张无形大网，将各种反对声音一网打尽，接受了华尔街游说团旨意的大大小小的美国鹦鹉，掀起了比《新大陆交响乐》更加激越的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大合唱，其中最刺耳的尖啸恰恰来自于金融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他们声称“世界一体化了，中国早晚都要取消金融管制，不如尽早取消”。这就如同在说“人早晚都要死，不如尽早弄死”一样地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论调却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主旋律，当12月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再次飞抵北京，准备举行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中国学术界金融界发出的响彻天地的开放主旋律告诉他，不用再谈了，美国的一切要求都能满足。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是，美国本来通过埃文斯提出的要求是，把外资对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由25%提高到49%，结果却是中国干脆取消了全部限制，成为金融领域完全不设防的国家。

天朝上邦的宽容大度激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乐观性格，美国人一扫前两次战略对话的冰冷面孔，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对话结束后，为防止国内揭露美国鹦鹉的民族主义呼声改变金融完全开放的决策，美国调动核潜艇、航空母舰支持台独搞322公投，同时策划藏独势力发动暴乱，东西两把匕首插向中国心脏，再内外夹击，煽动世界舆论抵制奥运会，用奥运会警告中国，必须尽快宣告放弃金融控制权。虽然最终322公投未过半数，藏独暴乱被迅速制止，抵制奥运会的运动也遭到海外华人反对，但是这连环三剑的夺命杀气，终于迫使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立刻发文向世界宣告了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决定，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首先，银行由外资控股，将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如果把现代国家看作是一个大股份公司，银行就是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就是董事长，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其他所有人，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身份，实际上都处于仆从的地位。国家国家，谁在经济上当家，国就属于谁家，谁就真正拥有国家。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绝非危言耸听。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化的现代金融条件下，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成为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以衍生品的创设和交易为主业，触角伸向所有产业，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金融巨无霸，无论它们的名称是叫银行，叫证券公司，还是叫其

它什么，其名称所代表的传统业务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新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不断整合各种经济资源，从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定价和再分配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即便是全部财富都流向美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不禁无能为力，甚至事先不得而知。这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财富分配上的根本区别，虚拟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可见，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战争，实际上是新一轮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控股，属于一种新的殖民地形式。历史上的殖民地有两种形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用军事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是殖民地，如当初的印度；用各种不平等条约控制的是半殖民地，如当初的中国。上述两种形式都是公开的殖民地，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斗争。目前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种隐蔽型的殖民地形式，就是通过控股对方的银行掌握其全部社会财富，把对方国家全部国民都变成财富的名义占有者。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这些控股银行和当地政府官员决定。所在国的全部企业和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义务，就是拼命挣钱，然后通过银行、股票、债券、房产等把钱交给控股银行，控股银行再把这些钱同样以各种投资的方式送回本国，形成本国财富，提高本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由此形成的所在国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只是表现为金融指数下跌，正常投资损失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爆发信用危机，而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股市却暴跌45%的原因。美国吃饭，中国买单；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就目前中国人来讲，悲剧还不仅仅是为美国买单，更大的悲剧在于美国高消费和中国低收入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人点菜很多，中国人票子有限，被迫只好掏光腰包后再预支子孙后代的资源，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巨大的环保投入。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在银行的监控之下。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钦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与被捆绑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猪完全一样。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控制中国各级腐败官员来讲，其可怕后果就不堪设想，收受贿赂的腐败款项大多都要经过银行，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腐败官员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就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越多，又会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西方国家控制并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如同八年抗战时期的伪满官员一样。目前中国金融国门被彻底打开，很难说与此前已经被外资控股的许多大型国有银行无关，而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不可思议地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内幕重重的严重腐败，随着国有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所有腐败行为都关在了中国人的视野之外。可见，对于现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讲，拱手让出国家金融控制权，甚至比拱手让出国防更加危险；拱手让出国防，强盗或许还会给顺民留下点儿财产；而拱手让出金融，则会被控股方剥夺的干干净净。

世界上对此最为清醒的国家，就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垒最为强大的国家。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主要包括：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

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法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股市的市值就超过全世界股市总和，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而中国是金融市场最脆弱的国家，却是国门大开、放弃控制。如果说美国如同金融市场上强大的虎狼，那么目前中国只能算作软弱的猪羊，现在连强大的虎狼都小心设防、洞门紧闭，而软弱的猪羊则栅栏大开、全不设防，甚至允许虎狼前来放牧。倘若中美关系按照这个逻辑就此演变下去，中国百姓前途危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挡外资银行这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之外，美国另外还有两道金融防火墙，就是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和共同诉讼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由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构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墙，仍然让外资银行难以在美国获得平等竞争的条件。美国管理集团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得任何金融机构都很难在美国兴风作浪，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基金便是绝好例证，中投公司拿出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黑石基金“三无股票”（无投票权，无知情权，四年内无退出权），这类投资完全是白送，可就是这种白送行为引起了美国管理集团的高度警觉，盎格鲁撒克逊人市场交换的直线思维方式，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白送30亿美元，于是便有了国会议员咨询，美国证监会调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终被美国舆论暴出，我们国人才知道又有数百亿人民币泡汤了。如果是简单泡汤中国人还好受些，最让中国人吐血的是，美国黑石基金拿着我们的钱跑到中国来又买走了我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中国对外开放到这个份上，恐怕连李鸿章地下有知都会哭哭不得。

美国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武器打掉了别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可是美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大火却越烧越旺，美国总统布什把中国文革时期的“天天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白宫，率领白宫一班人每天下午学习圣经，斗私批修到激动处，经常是泪流满面。中美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方面的此消彼长，让人想起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和李甲，商人孙富想占有书生李甲的爱人杜十娘，便在李甲面前把拥有杜十娘妖魔化为滔天大罪，结果是李甲主动把爱人杜十娘让给了孙富，杜十娘悲愤之极，跳江自杀。美国成功地扮演了20世纪末的孙富，诱导中国放弃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则不幸成为了穷秀才李甲，在丢掉爱人丢掉天良的同时，也丢掉了足可养育子孙三代的万贯家财。美国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使外资很难通过贿赂美国官员来廉价收购美国资产。即便是你能够突破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行政防火墙，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还会形成第三道也是最牢固的防火墙。共同诉讼制度最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全体美国民众都调动起来，有效制止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这套制度的精髓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文革，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大众政治制度的反映。可以说，如果纯粹站在本国国民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上最能有效保护本国利益的政府，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美国从中国吸收的大众政治制度，决定了你即便能够突破美国的司法壁垒，也能够突破美国的行政壁垒，还能够突破美国的资本壁垒，最终也无法突破美国的大众壁垒。反映美国大众利益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足以消灭任何敢在美国兴风作浪的资本势力。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用三道防火墙将外资银行拒于国门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设置了大众监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监管的大趋势：监管监管者。就是说，大众监管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而是监管者本身，监管整个金融管理集团。如同上述那样，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他们一个决定，就可以将成千上万亿财富或者灰飞烟灭，或者转移国外，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上，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间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并且这种财富掠夺的计算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上百万计，而是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获取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获得上百亿财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对赌中国指数，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没有任何风险，形成老子在国内砸盘，亲属在海外数钱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钱就越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滚滚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衍生品市场的原因。在一个“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场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从老百姓账户上划钱。股权分置改革不过2年，中国股市就出现了身价数百亿的个人股东，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过560亿人民币。正是现代金融惊人的财富掠夺功能，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人，监管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的人。这种监管制

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国民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随时送上法庭，无论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员，还是国家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已经当选总统后，因涉及“B B K股价操纵案”，也要接受司法调查。台湾陈水扁身为总统，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说，除中国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国家，任何一个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国家，国民都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了这条底线：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国民财富的公开抢劫；允许外资进入，等于是允许外资对本国国民抢劫；允许外资控股，等于是把全体国民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外资支配。

这就是我们一直呼吁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融证券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大众经济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大众化要求政治大众化与之相适应，把金融市场的决策者和监管者置于公众的直接约束之中（而不是简单的监督），公众有权将他们随时绳之以法。过去有句话，叫做领导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放到现代金融中，就是金融管理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在目前权贵和资本已经联合的情况下，要保证金融管理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就只有实行大众监管制度，舍此不可能再有它途。形成对决策者和监管者的大众监管制度，对当前中国来讲尤其紧迫和重要，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银行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型公司，同时还具有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并且由于以往银行代表国家利益，所以我们整个国家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保护银行的前提基础上，在对储户的关系上，赋予了银行经济、政治和司法的全面垄断地位，甚至具有立法权。银行可以规定储户取款，钱少了不管，钱多了问罪；银行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对门前道路实行部分“宵禁”，甚至银行直接与国家管理功能融为一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以国家名义宣布实行负利率。在目前这种银行兼具国家管理功能的条件下由外资控股，等于是把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外资银行的私人保安（外资银行大都是私人银行）。

在此人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金融集团要把控股权交给外国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大酒楼，控股银行就如同是收银员，为什么要把酒楼收银员的肥差让给外国人？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这些年发了大财的人一直在喊改革不可逆转，但是改革能不能逆转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够阻挡的，人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即便在改革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也能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取的巨大利益。要实现这一点，最佳的选择就是由西方国家控制中国金融。只要金融控制在外国手中，无论改革会不会逆转，无论中国是再出一个毛泽东，还是出一个普京，或者随便出一个什么拿破仑、罗斯福等等，都不会使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发生逆转。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来中国富人的基本经验。许多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国家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都是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唯独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这是由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中国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从来不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就是因为他们充满政治自信，不担心历史会发生逆转；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同样是因为缺乏政治自信，担心改革发生逆转。这种担心的结果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投靠洋人的渴望，中国历史上汉族精英集团屡次引领外敌入侵国家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内部阶级矛盾演变的结果，没有内部阶级矛盾演变成的汉奸势力，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觊觎和侵略中华民族。这也决定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关系，马克思包括后来列宁时期的欧洲，是民族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而中国则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所以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当作革命的头等任务。

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向西方，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出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一江财富向西流的罕见场景。这种财富转移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越来越不对称的利益竞争，即西方国家用中国人的钱贿赂中国官员，收买中国买办，培养美国鹦鹉，训练分裂势力，制造新型富豪，撕裂中国社会。中国平安老总原来只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小车司机，公司由国有金融机构变成外资金融机构以后，老总原地未动便成为年薪超过6千万元的新型富豪（还不包括天文数字的股份），这类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新型富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撕裂作用，在向中国所有官员、企业家和学者

宣告：只有把你管辖的一切变成西方财产，你个人的经济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实现。无论任何人，不管官位有多高，高墙有多深，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注定了永远再难回头，只能一直走到心灵地狱的最后尽头。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瓦解的，中国的道德体系就是这样崩溃的，中国的金融也是这样陷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为自己打造天堂的同时，却在把中国人打入地狱，把中国穷人打入贫困的地狱，把中国富人打入心灵的地狱。我再次想起了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砸碎了的那块牌子，现在又被中国遍地的西方走狗重新树立起来，树立在了每一个西方白种人的心里，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从西方白种人眼里，十分清楚地看到那块牌子。

窗外夜空划过一道细弱的流星，冰凉的泪水低落在键盘上，我不敢想象失去金融控制权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美国，正在把中国逼上凤凰涅槃的巨变前夜！

7. 中国要警惕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

来源：路透社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区域内再次出现了通胀上升、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值得警惕的信号。面对可能的第二次危机，大多数国家依然犹豫不决，不愿轻易实行紧缩政策，中国也不例外。越南和印度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国货币从升值走向贬值可能是弹指一挥间，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

现在几乎没有海外投资者认为人民币会贬值，除了国内少数专家。他们并不是认为人民币被高估，而是担心升值过快影响出口竞争力，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央行，打消人民币单边上升预期的因素。但这些言论可能会弄巧成拙，给中国带来更大麻烦。

国际外汇投资本来就是一项信心的游戏。从5月份人民币远期市场出现长达一个月的大幅下跌，就可看出对这种信心的基础其实相当薄弱。如果人民币贬值的心理预期真的建立起来，资本大量流出，人民币接下来真的可能要贬值。届时央行难免入市干预，防止疲软的人民币使得国内通胀雪上加霜，中国难免再像10年前一样，打一次“人民币保卫战”。

仅仅半年前，国际投资者还在赌亚洲货币会继续升值，但现在不少亚洲货币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印度卢比/美元今年来贬值7.7%，韩圆贬值8%，菲律宾披索跌6%，有汇率管制的越南盾跌了2%。现在的越南和10年前的泰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当初都是拼命吸引外商投资，借用大量的外债，而它们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偿还这些外债。

外国投资者一涌而入使得越南股市和楼市泡沫化，他们一哄而出则会触发泡沫爆破。就像当初索罗斯攻击亚洲货币一样，现在国际投机者已经瞄准了越南盾。在外汇远期市场，一年以后越南盾被认为要贬值30%之多。越南是否会蹈泰国覆辙？

越南，下一张多米诺骨牌？

仅仅一年前，越南还是全球投资者眼中的宠儿。2006年，越南股市大涨145%，2007年头两个月又上涨51%，推动越南股市总市值从2006年初的不足10亿美元，猛增到150亿美元。但今年来，越南多项经济指标亮起红灯，并遭三大评级机构降级，股市跌了55%。通胀率飙升至25%的水平。越南贸易赤字猛升，外汇储备则低于外债总额，财政赤字长时间维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约5%的危险水平。

越南的低利率政策引发了经济过热，政府在通货膨胀走高时没有急速踩煞车，听任通胀在负利率的刺激下继续恶化。如果亚洲国家和越南一样，在遏制通货膨胀问题上优柔寡断，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现在亚洲通胀已经全面蔓延开来，斯里兰卡通胀率达到20%，巴基斯坦为17%，印度尼西亚达10%。中国、印度、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通胀率都在7-10%之间。

诚然，越南是个小国，国民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50名以外，经济规模不到泰国三分之一。就算越南这只骨牌倒下，未必能够推动其它一系列亚洲国家。但越南的问题也是正在努力控制物价暴涨的其它亚洲国家共同面对的，如果他们不能果断采取行动，抑制不断上涨的物价，越南将是前车之鉴。

消极等待不如未雨绸缪

亚洲国家的通胀水平普遍是发达国家的2-3倍以上，高通胀国家的货币必然面对贬值压力。若想要稳定外国投资者的信心，防止外资大幅撤走，他们就有必要收紧银根，提高本国利率，但代价可能是牺牲了经济增长。亚洲国家之所以按兵不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等待欧洲经济放缓，外需减少后紧缩经济的必要性就不大了。但他们未必能够等得起。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中国立身之处算最安全。中国2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给人民币一道防火墙，而1.7万亿(兆)美元的外汇储备更给中国筑起了一座万里长城。由于人民币起点实在太低，因此就算升值三年以后，还有上扬空间。不过，虽然中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但中国同样面对资本流入过多，尤其是无法说明来源和去向的热钱过多的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有非常大的空间，中国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要比亚洲其它国家小得多，”里昂证券的亚洲经济学家Eric Fishwick表示。但他也说，人民币现在相对欧元依然被低估，但如果下半年欧元贬值，中国对欧出口跟着对美出口慢下来，中国日子可能就难过了。

“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永远不可以当它不存在，”Fishwick说，“投资者有必要密切关注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一旦增速放缓，可能这问题就不远了。”（作者：顾蔚）

8.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金融危机已无法避免！

2005-7-16 9:01:51

MIT斯隆管理学院的Thurrow教授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在美国家喻户晓。昨天他在上海发表惊人言论：中国的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Thurrow的依据是因为美国拥有的巨大的贸易赤字。“当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贸易赤字，必须借资本来偿还，本金、利息、复利，人类将无法击败复利。”Thurrow指出，美国2003年贸易赤字达到1500亿，这样其他国家必然有大的贸易顺差，目前，中国对美国有1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当游戏结束时，跟地理学相似，地震会在一定地形地貌下发生。”“也许地震发生在美国，但将影响世界。”他指出，一旦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存在，至少有2500万的就业机会将失去，而这些就业机会绝大部分在中国。

Thurrow分析说，美国迟早要解决这个贸易赤字问题，两种方式，软着陆或者硬解决。硬的方式，美元对外币汇率急剧下降40%，软的，在5年内每年下降8%。如果采取硬解决手段，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做好准备？

Thurrow甚至拒绝对“金融地震”如何避免做乐观估计。“危机不可能避免，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也无法对危机做预防。”“对于中国，必须建立的是一种能经受得住破产的金融架构。”换句话说，Thurrow对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建议就是，如何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来收拾危机后的残局，“面临冲击，准备如何！”

9. 中国金融开放：承诺的积极开放，没承诺的也在开放

江涌

当前，中国金融业病丛生而积重难返，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国家崛起的最大风险因素，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最薄弱环节。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历史上，美国曾利用各类金融手段牵制前苏联、遏制日本以及应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如今，以金融“敲打中国”正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项战略选择。近年来，美国不断以贸易逆差与“操纵汇率”等为借口，制造一轮又一轮摩擦，逼迫中国接受新的“门户开放”。美国对华鹰派曾公开扬言要持续施压人民币升值，像1980年代对付日本一样，让中国经济倒退10年。

中国金融脆弱性严重

首先；银行风险依旧是金融安全的重心。

实际不良贷款或有增无减。据银监会公布，国有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由2004年初的约20%降到2006年末的约9%。但是，有研究表明，若剔除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等因素，同期实际不良贷款余额与比率难以乐观。更为严重的是，不良贷款比率的降低主要通过“扩大分母”（即多贷款）所致，且多半为中长期贷款，这极大地增加了未来银行风险，一些风险（如千亿计的高校扩张贷款）正在显形化。

操作风险突出。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疏于内部治理，信用和市场风险不佳，操作风险则更为严重。近年来，国有银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总行行长下到电脑操作员，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乃至数亿，触目惊心，暴露出因金融违规、金融腐败、监管滞后而导致操作风险的防控存在严重缺陷。尽管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股改”，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士普遍认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没有实质改观。

金融市场与社会风险不断向银行风险转化。新一轮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正在生成，而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研究显示，银行直接与间接进入房地产业资金占银行新增资产约60%。由于银行系统仍以抵押为基础，在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生成过程中，抵押估值过高，因此一旦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灭或持续遭遇重挫，银行不良贷款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形成与1990年代日本一样的银行危机。

金融开放风险莫测

首先，开放“失序”产生的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出现“失序”倾向：“入世”承诺的，积极兑现；很多“入世”没有承诺的。也在“自主”开放，而且还是加速推进。金融开放“失序”势必增加中国金融风险。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止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对此不能麻痹大意。

其次，国际金融风险传递。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秩序剧变，国际金融日趋动荡，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重要金融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风险骤升；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深化，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蕴藏的巨大获利机会，使中国正在成为国际资本的“热土”。

自2002年以来，全球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间接或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甚至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涌进中国。国际金融的日趋动荡，由此也威胁到中国汇率稳定、巨额外汇储备与美元资产价值，加速国际金融风险向中国金融市场传递。

10.越南惊变：新亚洲金融危机最后警告

作者：张庭宾

越南是2008“新亚洲金融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吗？

2007年1月1日，笔者撰文《警惕2007热钱：为2008酝酿新亚洲金融危机》，它指出，如果不能控制人民币等亚洲货币的升值速度，不能有效遏制热钱投机，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很可能卷土重来。

遗憾的是，这个此后不断提高级别的警告并没有引起亚洲国家的足够重视，现在，新亚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已经迫在眉睫，新的悬念是，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会从哪里开始倒下，现在答案水落石出——越南。

3月下旬，越南国家银行听从了“以本币升值控制通货膨胀”的谬论，将越南盾与外币的浮动幅度由0.75%扩大到1%。然事与愿违，越南盾由升值变为贬值，在2个月内快速贬值2.6%，在远期汇率预期的NDF市场下跌的更为猛烈，5月30日NDF汇率市场预期越南盾未来一个月将贬值7.6%，12个月贬值28%。与此同时，韩国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也开始了货币贬值。

在越南，股市危机已经发生并继续扩大，至5月30日，胡志明指数已比历史高点跌去65%，2008年以来已经下跌55%，它还是一场房地产危机，胡志明市的房价已经跌去一半，而商业银行等金融系统的危机难免接踵而至。

我们还能抱着侥幸的幻想——越南危机是一个偶然事件，不会传导到中国，亚洲，乃至全球新兴市场吗？

不能！原因很简单——危机根源是共性的，本币的连续大幅升值吸引大量热钱投机，股市、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大幅膨胀后破灭，石油、原材料、粮食价格暴涨推高了通货膨胀率，紧缩性货币政策极大地挤压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

现在，最后的总攻正在发起，美联储已表明拒绝再降息的态度，接下来，美元势必进入加息升值通道，这无异于向投机新兴市场国家的万亿美元热钱发出大撤退信号弹，倘若巨额热钱短期急速撤离新兴市场，中国能侥幸置身事外吗？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说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镜子”因为中国金融没有开放得以避祸的话，十年之后，随着金融不断开放，上述共性动荡之源中国大多都身在其中，越南这面最近最新的“镜子”一定要引起我们最高级别的警惕。

最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是什么呢？应对危机时错配的越南货币政策！它不但没有达成目标，反点燃了导火索：一，“以浮动区间扩大促本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非常错误！结果立竿见影地促使本币贬值。二，以本国银行系统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大幅加息、巨额发行票据来抑制通货膨胀，非常错误！造成本土金融系统资金链的极度紧张和《CIMS 论文的天地》电子书库 搜集整理

货币恐慌。

上述政策的最大错误在于——是热钱生病，本土金融和企业吃药。此轮全球新兴市场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大量热钱投机哄抬物价；二，因美元贬值导致的石油、粮食等价格大涨。对于后者只能以预见性的黄金、石油、粮食等战略储备对冲（本报早在 2005 年 7 月就建议有关部门大规模增加黄金和石油的战略储备），否则只能比谁更能“挨饿”；更重要的是，它的货币政策没有抓住主要对手——热钱，有效约束和打击热钱投机，反而通过货币政策紧缩大大挤压了国内银行和本土企业生存空间，客观上增添了热钱兴风作浪之威。

从战略上讲，即使此轮新亚洲金融危机最后冲击中国，笔者觉得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因为目前人民币升值仍未达到热钱满意程度，股市和房市泡沫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中国“世界工厂”的产业集群能力无人能及，中国人的忍耐力和应变力很高，国家的紧急动员行动力很强，一定能挺到这场消耗战的最后。如果在一轮全球新兴市场危机后，当别国竞争者被市场驱逐，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反而能够更巩固，我们买石油和铜也会便宜的多。

况且中国的货币主导权仍然在握——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港股直通车”被停掉了；央行可自行决定第二天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仍拥有一次性重估货币的权力。股指期货没有推，热钱无法借力打力做空中国。最为关键的是，如果热钱大撤退，央行像次贷危机中的美联储和伯南克那样，镇定果断地释放流动性——把过去紧缩的存款准备金和央票等放出来，向市场和金融机构提供无限量的流动性，就足以和热钱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消耗战。

唯一能致中国货币决战惨败的是，如果重蹈越南覆辙，中国货币政策同样继续错配——在热钱已经预期在不远的将来做空人民币的情况下，仍然加速人民币升值；在国内商业银行和本土企业资金链已经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反而更加紧缩货币，让本土金融和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休克；如果在热钱已经准备大规模撤离的情况下，反而加大力度推进资本“严进宽出”的政策，那将正中热钱下怀。

需要郑重警示的是，现在这种僵化而固执的货币思维仍大有市场。如果在越南货币危机近在眼前的警告下，这种货币政策错配仍然发生，并使之演变为国家经济灾难，那将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最大遗憾。（作者为本报副总编辑）旧文重登

11.警惕 2007 热钱：为 2008 年酝酿新亚洲金融风暴？

2007-1-1 第一财经日报

张庭宾

在时间洋流从 2006 流向 2007、2008 的金融海洋上，突然翻起了一朵夺目的浪花，让世人有机会一窥海面下暗流汹涌的方向。

2006 年 12 月 18~19 日，泰国爆发“一日货币战争”——18 日晚，泰国央行下令，从 19 日起，实施外汇无息存款准备金的系列举措，以增加热钱进入成本，缓解泰铢升值压力，预防热钱大进之后再大出之时的金融悲剧重演。

热钱当即犀利反击，19 日泰国证交所指数（SET）暴跌 14.84%，市值蒸发 230 亿美元，泰国央行当日宣布取消上述管制措施。

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铢因热钱撤离暴跌不同，此次是泰国央行意在打“预防针”，但一日败北，还是让人大跌眼镜。毕竟当年泰国央行抗击了近两个月，如今卷土重来的热钱显然已更加强大，先拿泰铢“祭旗”。

这就引发一个巨大的悬念。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从泰国开始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倒下至中国戛然而止。在金融基本封闭的中国内地坚强后盾之下，香港与投机热钱两度决战，热钱知难而退。如今，假如更加强大的热钱再度冲击而来，中国能否依然安然无恙？

中国金融“围城”不再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而，我们不能以中国昔日免于亚洲金融危机为由，推断出中国明日无忧。

十年来，中国的变化惊人，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下称“工行”）之变最为突出——谁能想到，2006 年 12 月 25 日，工行市值达到 2142 亿美元，已经超越汇丰银行，成为全球第三大的上市银行。29 日，工行市值跃升至 2511 亿美元，再赶超美国银行，晋级“亚军”，距离市值“冠军”——花旗银行 2740 亿美元也仅一步之遥。

在中国“世界工厂”蓬勃发展的基础上，过去两年中，中国的金融改革全面突进，与国际金融一体化加速，昔日封闭而独立的“围城”大半已不复存在——国际金融市场已直接或间接（通过香港）同内地银行、股市、汇市建立全面连锁反应机制。

此时此刻，这样的问题已不容回避：假如热钱再次冲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内地能否置身事外？假如工行股价在香港股市大跌，内地股市和金融系统会发生怎样的连锁效应？一旦热钱发动新亚洲金融风暴，它们的套利机会在那里？中国如被动应战，怎样在这场零和（乃至负和）博弈中胜出？

这并非杞人忧天。截至 12 月 29 日收盘，工商银行（601398.SH，1398.HK）A 股在过去 5 个交易日上涨幅度接

近 30%，市盈率达到 41.2 倍，市净率 4.21 倍；H 股市盈率 33.68 倍，市净率 3.33 倍。而同时的汇丰银行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 13.45 倍、2.07 倍。

值此投资者高度亢奋之际，必须有人保持冷静的头脑，就工行内地、香港的市净率分别比汇丰银行高 103%、60% 给出合理解释。

市场人士目前提供的答案有这样几个：A. 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商银行获益最大。这个回答将漫长的逻辑链条省略了，并不有力。而汇丰已进入内地，同样可以部分搭载“中国号”列车，并可能在中高端客户市场与工行竞争。B. 工行上市后，公司治理水平提高，盈利能力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高有利于内“守”，而“攻”取利润的能力非一朝一夕之功。C. 工行的内地网点最多，价值最大。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当今网络金融时代，营业点众多也意味着成本更大，包袱更重。D. 内地股指期货即将推出，对工行股价有上推作用。这可以解释 A 股市盈率高于 H 股，却无法解释 H 股市净率会高出汇丰 60%。E. 中国内外资所得税并轨消息出台，有研究认为，工行的利润率可由此增加 10% 以上，但这个解释并不足够。

最后的理由是：一、2007 年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预期推动。二、工行股价已经出现一定高估，并且两者相互影响。

升值压力“醉翁之意”

人民币升值到底会对人民币资产价值的重估作用几何？

从简单的汇率换算上看，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 1%，以美元计，净资产就上升 1%。但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净资产的上升必须经过兑换完成，并变成实际购买力，方才有意义。鉴于工行绝大部分业务均在内地，至少在三五年内，其美元资产持有比例不可能太高，这期间，人民币兑美元的上升势头是否逆转还是一个问号。如果逆转真的发生，则现在推高工行的能量有多大，届时摔跌它的力量就有多大。如此先扬后抑，需要一个前提：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大幅推动人民币升值。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则先要给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入“罪”。如今这种舆论已经铺天盖地——世界经济已失衡，中国贸易顺差是罪魁祸首，人民币低估导致贸易顺差，为赎“罪”，中国必须将人民币升值，而且是大幅升值。

在笔者看来，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首先，在 WTO 框架中，各国完全有权力选择各种汇率制度，包括固定汇率。况且各种汇率政策的选择，并不存在谁更好、更先进的问题，只有更合适的差别；其次，所谓的世界经济已经失衡的判断是单向的，现在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确实存在，但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的美元金融资产，中美双向是动态均衡的。

如果从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收益来看，美国受益远超中国。简单举个例子，假定原来美国生产一双耐克鞋要支付成本 20 美元，从中国进口只要 4 美元，这样美国就获得 16 美元的净收益（减亏也是收益），而中国每双鞋获得的净利润可能只有 20 美分。如此，美方就获得了 16.2 美元新增收益蛋糕的 98%，中方仅获得不足 2%。

“中国制造”不仅这样巨大地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给了美国人丰厚的利率补贴——实际上，格林斯潘掌管美联储的 18 年，美国之所以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奇迹，经济周期理论几乎“失效”，究其根本，除了新经济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制造”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实惠。

为什么某些美国人士不仅不感恩，反而一再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呢？原因不外有三：一、这给了贸易保护以口实，以逼迫中国企业支付更多的反倾销税、诉讼费，进一步侵蚀中国企业微薄的利润。二、逼迫中国购买更多贬值中的美元，为美联储增发货币买单。三、以此威胁利诱中国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空间，扩大资本项目开放，为热钱大进大出创造条件，以诱发中国金融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尚待解决的隐患，制造一场新亚洲金融危机，以之摧毁中国的金融系统，进而遏制中国的战略崛起。

在工行上市之前，相信前两个是主要原因，而此后，第三个正在上升为核心动机。原因在于，2006 年，中国证券市场的 IPO 募资额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令华尔街为之震惊。与“世界工厂”和美国金融虚拟经济高度互补不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与美国金融市场产生竞争，换言之，某些美国人乐见一个中国“世界工厂”，但未必希望看到一个亚洲“华尔街”。

1985 年日本“广场协议”之后，亚洲就曾经失去了一次成就“国际金融市场”的机会。

“定海神针”不容动摇

工行得以上市成功，再一次显示了中国昌盛的国运。

包括工行在内的中国三大行上市，正值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并酝酿对伊朗动武之际，石油危机连带美元危机一触即发。不少国际投资者为分散风险，向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转移了大量的资金，而三大行的上市刚好满足了他们这种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三大行上市，仅仅意味着它们向现代市场化银行转变开始，其曾经的隐患，除了政府已冲销的部分，其余并不会自动消失。事实上，随着人民币业务放开，汇丰等外资行将利用其成熟的经验和国际网络，与工行争夺高端客户；工行内部减员增效也尚未见大动作；其员工激励机制至少短期内还是奢望。简单地说，银行系统

仍然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中较脆弱的部分，接下来盈利能力的提升才是真正艰苦而细致的新“长征”。

在太平洋彼岸，随着高盛前 CEO 保尔森就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美国调整了国家战略，对外缓和中东局势，国际石油价格大幅回落；国内对通货膨胀更为强硬，房地产市场降温，美国经济开始主动调整。华尔街思路再次主导美国政治经济。

在全球资本市场，以华尔街为核心的国际热钱，很像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的铁蹄可以践踏别族的城池，掠夺他人的财富，不计后果，但对自己的发源地总是眷恋有加——除非他们失去了控制权。如今他们还会再次出击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曾在墨西哥、巴西、英国、东南亚、日本、俄罗斯等地屡屡得手。

如果他们真的要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争”，除了自身力量比 10 年前更强大之外，中国金融也已经更加开放：A.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基本实现价格联动，而资本进出香港完全自由；B.中国内地股市激活，2007 年可能大幅跌宕，热钱进入中国不再担心投资收益率，尤其是股指期货推出时存在巨大的套利空间；C.目前香港实施的是与美元基本固定的联系汇率政策，而内地实施的是小区间浮动汇率政策，这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D.热钱进入已较难控制，而热钱离场基本不存在障碍……况且，中国的资产价格已开始出现高估苗头，金融资产价格在 2007 年可能继续抬高。

当然，他们的眼前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还不够大，这使得他们撬动人民币汇率、香港联系汇率、内地股市、香港股市、中国金融资产价格之间杠杆的强度不够，另外微幅的人民币汇率空间对他们变现离场非常不便。

因此，2007 年币升值幅度和汇率浮动空间是否扩大，已经成为中国能否预防和抗击亚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关键高地，一旦这一战略要点失守，中国资产泡沫会加剧放大，而今，所谓“中国后奥运衰退”的舆论已经时隐时现……

可以想象，2007 年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大于以往的任何一年，因为维持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不变，中国就拥有“定海神针”，而它也恰恰是热钱及其背后政治力量的“眼中钉”。中国需要为捍卫这根“定海神针”下最大的决心，因为不会再有什么比失去它的后果更加严重。

在 2007 年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泰铢惊变已经敲响了警钟，对于可能酝酿中的新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需要高度警惕！（第一财经日报）

12. 惊叹：皇甫平（周瑞金）不幸言中——越南已经走到中国前面去了

云淡水暖

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震撼中国和世界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还有社会主义举国体制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巨大优越动员效能，更有全中华民族同舟共济、有难同当的民族凝聚力。就在中国的自然灾害的震动尚未完全平息的时候，一阵不大不小的“地震”，又从中国的邻邦——越南传导过来，而这次“地震”对越南来说也是非同小可，因为这次“地震”是经济上的，而且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核心体系——金融，因为有人已经在谈论越南货币越南盾的“倒下”了，就像 1977 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讨论其源头——泰国货币泰国铢的“倒下”一样，97 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伴随着泰国铢的“倒下”而席卷整个亚洲的。

曾几何时，越南的“改革开放”还在一片喝彩声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大声赞许中被世人瞩目的，2006 年 11 月，美国著名主流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发表过一篇文章被广泛转载，叫做“南方之歌：越南革新使经济焕发生机”，据文章描述，“从 1975 年到 1986 年，越南进行了一次灾难性的斯大林主义集体化试验，将无数南方资本家赶进劳改营。”，然后，“在南方企业家的推动下，越南进行了经济改革，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0 年来，越南经济的增长速度接近中国的发展速度。…如今的河内处处彰显着富足——进口车、咖啡店以及形形色色的店面。这里还住着来自南方的高层政治领导人，其中包括总理阮晋勇和国家主席阮明哲。…1991 年到 1997 年，武文杰出任越南总理。其间，越南加入了东盟，并在他的推动下进一步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

有意思的是，“越南领导人也都与时俱进。…‘许多领导人都曾在海外接受教育。’越南的农业部长曾在哈佛大学留学，教育部长拥有德国博士学位。总理阮晋勇的高级经济顾问武明，最先在苏联求学，后来又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1 年，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在银行服务上陷入僵局，阮晋勇授权他代表越南在‘关键时刻’作出让步，为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

越南在银行服务上对美国作出了什么样的“让步”，可能要由专业人士作出评判，但是，如今专业人士要

忙于判断越南的货币体系什么时候“倒下”，而越南盾的“倒下”会不会是煽动新一轮亚洲金融风暴飓风的“蝴蝶的翅膀”。

据报道，越南通货膨胀率连续七个月达到两位数字的水平，5月通胀折合年率更高达25.2%，由此引发了当地大规模的罢工行动。随着投资者转而投资黄金，股市也已崩溃。从外汇远期市场价格看，投资者预期未来12个月越南盾还将贬值40%。

而此前的越南经济，却一直是“高速增长”的典范，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东南亚国家货币之一，越南盾一直处于小幅升值的态势。“小幅升值”居然引来了大量逐利的热钱，热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性，让越南股市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大戏，有人预测，从越南撤退的热钱，冲着中国股市来了，是否如是，拭目以待。但是，人们应该从中读到一些带有共性的关键词：通胀、货币升值、热钱、金融控制权…

有意思的还有中国的“南方之歌”，对于越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路径，中国自诩“最好的报纸”南方报系们曾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2006年，《南方》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也可以说高歌了一曲“南方之歌”。当然，此次越南迫在眉睫的金融风暴，“南方之歌”也不甘落后，《南方都市报》6月8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由当年在人民网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知名网友”吴中校执笔，标题叫做“谁让越南从天堂到地狱”，其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经济改革还是卓有成效的。从农村承包制，国企改革，到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不难看出其中带有深深的中国影子。然而越南改革要比中国更快更开放，步子也更领先中国，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领域的改革。”，现在越南走到“地狱”了，草民更想起了一位比这位吴中校更为“知名”的人物，就是以皇甫平为笔名的周瑞金先生。

在1991年发表的系列文章引发关注的周瑞金先生自诩“皇甫平”是意喻“受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又在2006年1月1月再次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再次“辅佐”了一次“改革”。在越南金融危机发作的此刻。最为具有延续意义的是，也是在2006年，辅佐家在《观察星》上发表文章“皇甫平：越南改革值得关注”，被海内外媒体大量转载，文中的核心观点是【可以看到越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走正路，出实招，迈实步，收实效的。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正当越共更坚决更大胆向着全面改革大道上豪迈前进的时候，中国国内却陷入了一片改革反思与纷争之中。就从这个意义上，越南改革不是很值得中国关注的吗？】，按照辅佐家的意思，2006年的“一片改革反思与纷争”，导致了学生——越南，走到了先生——中国的“前面去了”。

这还不算完，2007年2月《南方都市报》与辅佐家再次联手大谈“越南经验”，发表访谈“周瑞金回应第三次改革争论：应借鉴越南改革经验”，把“越南经验”上升到如何“回应”所谓的“第三次改革争论”的高度上，并且，辅佐家摒弃了邓公的“不争论”定义，说“本来不争论是邓小平的发明，但改革发展到今天，不争论是不行了。”，看来，辅佐家也认为要开始“争论”了，但在哪里“争论”呢？主流媒体辅佐家游刃有余，但也关注到网络平台，所以其《改革不可动摇》最先发表在网络页面上。辅佐家“争论”道【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借鉴越南的改革经验，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辅佐家这里谈的，主要是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是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是基础，辅佐家所说的“越共更坚决更大胆向着全面改革大道上豪迈前进”，当然离不开经济基础。照道理，上层建筑的改革，一是依托经济基础，二是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离“南方之歌”的中外大合唱才过去了两年，离辅佐家再次说“学生（越南）走到先生（中国）前面去了”仅过去一年，“更坚决更大胆向着全面改革大道上豪迈前进”的效果就初显了，那就是越南盾的被讨论“倒下”。

草民记得，辅佐家的所谓“中国国内却陷入了一片改革反思与纷争之中”的一些问题，就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的反思，今天看来，这些反思不但必要，而且很及时，直到现在，反思的声音还是在网络平台上很顽强地发出。越南的金融危机的初显，是不是可以告诉人们，在金融开放的道路上，先发国家们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和 design 的一系列“创富”游戏，对于后进入的国家，也许就是现实的或者潜在的“陷阱”，一旦深陷其中，就无法自拔，只能成为先发国家牟利的乐土或者转嫁危机的“堰塞湖”。

比如，总理阮晋勇的高级经济顾问武明，2001年在“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在银行服务上陷入僵局，（总理）阮晋勇授权他代表越南在‘关键时刻’作出让步，为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这种“让步”当中，双方的利益和义务是否得到平衡，就很值得探讨，过度、过快的金融开放，热钱涌入，虚拟经济部门快速膨胀，是不是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人们还是应该惊讶于辅佐家皇甫平（周瑞金）的“名嘴”的威力，辅佐家提醒“学生（越南）走到先生（中国）前面去了”，抛开其政治体制上的内涵，仅看经济层面，越南的这一幕“劫难”，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种“走到前面去了”，哈佛大学留学的，拥有德国博士学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越南高官和“智囊”们，怎么就没有对金融危机的前瞻性呢。

辅佐家皇甫平（周瑞金）老拿越南说事儿，也许这次却被他“不幸言中”，“学生（越南）走到先生（中国）

前面去了”，这回，据说“先生”（中国）也在关注这个“走在前面”的“学生”（越南）的教训了，看来，“前面”并不全是坦途，是悬崖也未可知，就像如果有人主张“小跑中的问题，要用四蹄狂奔来解决”，就值得深思了。

13.将钱存外银？全面开放金融？卖光国资？看阿根廷的教训！

发贴人：218.6.199.* 发帖时间：2006-8-3 【复制本帖地址】[必看]

<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608/show439350c30p1.html>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文章：须防“双刃剑”效应 阿根廷银行改革三点教训值得借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阿根廷前些年全面向外资开放银行、证券领域，后来爆发了金融危机。

专家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昭示，引进银行战略投资者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前的金融领域开放中，中国应充分借鉴其中教训。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曹红光和副研究员杨斌研究分析说，阿根廷金融业开放历程，既有初期遭受的强烈冲击，也有外资大量流入带来的一时繁荣，但结局是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这表明，银行开放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园”，如应对不慎，很可能风险重重。阿根廷银行改革中的三点教训尤其值得深入研究，引以为鉴：

教训一：银行业引进外资能促进增长，但稍有不慎就会受制于人。

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极快：1992年，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82%，处于压倒优势；但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48%，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52%，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在短短5年中猛增了4倍多。但阿根廷政府对此趋势未加防范，反而继续鼓励扩大开放。阿根廷民众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到2001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萎缩至33%，外国资本占到67%，占压倒优势。外资银行还能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权，阿根廷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难以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发展，外债迅速增长，出现金融失控的局面。

杨斌指出，目前我国在银行改革中不应迷信“国际接轨”，而应警惕国际资本的渐进性侵蚀，防备其逐步削弱经济安全防线，绕过政府管制、获得突破口后发动全面攻势，来不及预防就迅速产生雪崩效应，像阿根廷等国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

教训二：跨国银行不可能确保引进国民众的存款安全，反倒会带来资本外逃和存款冻结之害。

金融自由化初期阶段，阿根廷通过私有化出卖国企，能吸引一定外资刺激经济增长，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逐渐卖光国有资产后，外资流入趋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难以通过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逆差，政府税源减少难以应付沉重的外债包袱，金融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大。这时，阿根廷政府才发现经济金融命脉已控制在西方手中，政府不仅丧失宏观调控能力难以扭转局面，也无法制止资本外逃并确保民众存款安全，甚至还丧失了继续吸引外资、寻求外援的谈判筹码。初始时西方金融资本逼迫阿根廷推行私有化，当阿根廷发生危机后外方又以没有国有财产抵押品为由，拒绝向其继续提供必要贷款援助。

阿根廷企业和民众为躲避金融风险，纷纷将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转换成美元，存入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本地机构，但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成为避难所，反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令阿根廷民众蒙受惨痛的财产损失。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联邦法院和议会进行的调查表明，花旗、波士顿、汇丰等外资银行涉嫌违法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将阿根廷民众300亿美元存款转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别可疑的资本外逃案件，发生在2001年11月末，有385辆装甲卡车将数十亿巨额美金，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运往美国，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其他较小的国际机场，运往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金融监管松弛，属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钱中心。阿根廷国会议员卡利罗曾指出，转移到海外的数百亿美元外逃资金，相当部分是阿根廷民众的存款，民众信任并将自己的储蓄托付给外资银行，结果却在2001年12月遭到冻结。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郑良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渐进道路，特别是银行、证券等领域开放起步较晚，直到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才面对美国要求开放金融领域的压力，人们对金融自由化的潜

在风险认识不深，更应深入研究阿根廷等先行转轨国家的前车之鉴。

教训三：金融开放应竭力防止形成官僚买办的利益集团。

阿根廷腐败官僚买办阶层的形成，是最终酿成严重危机、造成民众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官僚层为获得腐败利益，无视外来竞争对民族经济的强烈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化、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通的监管，任凭外资控制银行、证券等战略行业。阿根廷前议员马里奥曾指出，前经济部长卡瓦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作出类似殖民地的货币局制度安排。西方财团同阿根廷的少数富翁勾结，通过高利率的外债、国债等形式进行掠夺，金融开放和外资银行提供了资本外逃渠道，10年来向海外输出了1300多亿美元财富。阿根廷议会还向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花旗银行涉嫌洗钱的证据文件。

金融开放中出现腐败的官僚买办利益集团，还会严重威胁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有关专家指出，需要加强法治建设，调整构架形成权力制衡和监督，防止腐败势力同外国势力合谋，造成国家利益的严重流失。

14.从巴西、阿根廷、韩国看外资控制本国银行的后果

[国是论衡] 阅读[29748] 回复[37] 爱国者ab999 [发纸条] [个人资料] [2008-04-10 13:53:17]

<http://bbs.service.sina.com.cn/treeforum/App/view.php?bbsid=69&subid=0&tbid=735&fid=34590&id=19646>

从巴西、阿根廷、韩国看外资控制本国银行的后果，银监会3月27日公布《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即由外国资本由原来的只能参股中国银行变为可以获得控制权。征求意见稿出来后，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除了少数比较敏感的人写了些评论，多数网络论坛上基本没形成讨论。原因可能是多数人对银监会的办法究竟会带来什么结果并无把握。人民网“说吧”关于此事评论，一个网友说：“市场永远是对的，没有必要用人的意志去改变它。只有经历了风雨我们的市场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痛并快乐着。”显然对“市场化”与“金融控制”没什么概念。贫道注意到，一些反对银监会“办法”的文章，论述了银行由外资控制的危害，但这些论述很多方面是理论推演，说服力并不强，也不能给大家一个直观感受。贫道写了个《清明节有感：船要翻了——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但会复辟半殖民地》帖子，可能语气太悲观，强坛没有给发，只好以“杨毛”名字发在乌有之乡上。点击数近万，很多网站转载。但贫道觉得自己2003年出道就在强坛上，有义务把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点，于是写了这个帖子，语气和内容力求符合要求，希望版主给发了。允许外资控股本国银行，并不是当前世界市场经济的“现实”，这些事情只真实地发生在少数所谓“新兴市场国家”，也就是前殖民地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并没有被外资控制，都是本国资本或者国家控制着的。英国是金融祖宗，没有人能控制英国银行，法国最大的10家银行，8家是国有银行。美国喊叫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最厉害，美国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通过专门立法，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也就是说，西方国家金融权没有交给外国资本控制，不仅仅是这些国家本来的金融资本就雄厚，外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难以控制他们，而且还都设有金融壁垒，让外国资本无法控制本国银行。

确实有几个国家的银行试行了控股权开放的政策，并且真实地实现了银行基本由外资控制。这就是巴西、阿根廷和一些拉美国家，以及相当多银行被外资控制，印尼和很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甚至韩国一些重要银行也被西方资本控制。也就是说，金融开放和金融市场化并不表示一个国家的银行由外国资本控制为前提，银行被外资控制显然是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是某些规则的结果。即使“市场永远是对的”，也是有两条路可走的。那么接着一个问题是，假如银行被外资控制，真的会“真正的健康起来。痛并快乐着”吗？恐怕恰好相反！贫道这里不用什么逻辑推演，也不假定存在什么“西方阴谋”。事实是，一些国家在被西方蛊惑和世界银行的逼迫下已经实现了金融“全面开放”并最终国内银行被西方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控制，这种控制造成什么后果也都明确显现了出来。最主要的是，这些事情并不是久远的历史，而是发生在最近十几年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如果我们无视这些眼前的事实，或者不告诉中国人这些事实，甚至掩盖这些事实，最终会被称为“骗子”的。阿根廷是比较早推行金融全面开放的，允许外资控股本国银行，甚至主动出让银行国有股本。90年代是阿根廷加速金融自

由化阶段。阿根廷金融在与西方全面接轨前的国有资本从1992年占银行资本的82%，下降到接轨后97年的48%。外国资本控制了52%。在外资在阿根廷银行控股超过一半的时候，“恰好”阿根廷发生了“金融危机”，整个金融体系接近崩溃。短短一年内，阿根廷银行国有股本又下降到33%，西方资本控制67%。阿根廷最大10家银行中，8家属于国外资本控股。终于完成了金融全面开放的“改革任务”。阿根廷在此前近30年中，经济也飞速发展，gdp增长率并不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低多少。中国1980-1997年年增长率为9.2%；阿根廷即使80年代发生过严重债务危机，但同期增长率依然达到8.8%。这个时期人均国民收入甚至超过原来的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2001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gdp下降到1997年的31%，下降三分之二还多！这是什么局面，即使不亲身经历也可以想象出是什么状态。2004年经济恢复，也无非达到1997年的42%，现在10年过去了，阿根廷经济依然与1997年差一大截子。日本所谓10年停滞，经济总量并没减少，就让我们唏嘘不止，想想阿根廷还不毛骨悚然？阿根廷“痛”是痛了，“快乐”吗？政治局势动荡，曾经1个月换了5位总统；社会混乱，到处游行示威，死在警察枪口下的动辄数十人；中产阶级把钱存在国家银行不放心，都存在外资银行，结果外资银行首先出逃资金，动辄以百亿美元计，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结果大量中产阶级破产滑入贫困阶层，当然这还包括股市大跌带来的损失；2001年底短短3个月，150万阿根廷人加入失业大军，贫困人口上升到总人口的42%，又过10个月，到2002年10月，贫困人口达到总人口的57%，2003年超过60%。阿根廷本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彻底崩溃，2002年竟然有数百名儿童饿死，而阿根廷是世界谷物和肉类生产最丰富的地方。显然，阿根廷人“痛”了，但一点也不“快乐”！问题在于，阿根廷人的灾难与金融权的丧失有关系吗？金融自由化开始时期，大量外国金融资本涌入，股市大涨，楼市大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很多文章，尤其是王小强《投资赌博新经济》一书里详细论述了这个过程：所有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在此后都出现金融风暴，外资突然出逃，股市楼市崩溃。到这个时候，国家突然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因为现代经济命脉已经不是矿山和其他基础行业，而是金融。阿根廷失去了金融控制权，政府没有任何能力控制资本外逃以保障阿根廷居民存款安全，也丧失了吸引外资，乞求外援的手段，因为国家在此前已经把国有资产卖个一干二净，现在连抵押的东西都没有——而所有银行这个时候都突然强调的全额抵押制度。而国内民族资本在经济崩溃中不仅流动资本损失严重，而且所有存款都没了效用。于是，包括银行在内的阿根廷国家和民族资本陷入极度困难，这恰好为西方资本彻底控制阿根廷经济提供了机会，于是，阿根廷被廉价卖光了。阿根廷这个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不是写在教科书里的事情，而是发生在几年前！如果这是几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事情，有人还会说“时代不同了，环境不一样，当时发生的事情现在不一定会发生”。可这几年世界所有经济关系没发生什么变化，大的环境依然如故。最可怕，也是最可笑的是：我们亦步亦趋地走着阿根廷人的道路，只是还没掉下去。失去金融控制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国家将陷入一种新的半殖民地状态：所谓半殖民地，并不仅仅是政治依附，主权缺失，也包括经济活动有一半实际是由外国人说了算。名义上的主权你都有，但是你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不得不由别人摆布。中国一定有人会说：摆布就摆布吧，让美国人摆布总比让共产党摆布好。听了这些话，你就想想阿根廷人并不是共产党执政，可阿根廷人并没有快乐。也许有人会觉得，即使丧失了这样的主权，到时候想办法夺回来就是。怎么夺？人家控股了你的银行，出的是真金白银，既合国际惯例有是你国内法允许的。人家占到60%，你能强迫增资转换股份？而且这个时候国家肯定捉襟见肘，哪里有钱做这些事情？继续变卖国家资产，这个时候国有资产早就所剩无几，把海南岛卖了？把解放军卖了？巴西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旦金融被外资控制后政府能做些什么的例子。巴西与阿根廷基本同一时期做了同样的事情。巴西政府自1990年3月起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开放化、放宽投资管制、国营事业民营化等。国有资产包括银行控股资产大量出让给西方跨国公司，二是将本币雷亚尔与美元挂钩，三是大幅度提高利率。这两点都是想吸引外资进入。这些措施很符合世行和西方要求。于是，大量外资流入，通货膨胀率降低到10%，经济高速增长。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经济逐年下滑，到02年最低点为97年的56%，后来虽然增长，04年也仅为97年的57%。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100多亿美元游资要跑，巴西政府将利率提高到40%！于是又获得稳定。到1999年，新的危机又来了。巴西银行利率竟然提高到49.5%！危机又过去了。但是，长期实行这么高的利率，其他行业的投资几乎成了没用的傻事（干什么也不能保障40%以上利润）。大量本来投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都进入了金融领域。这就是所谓拉美特点的金融危机。危机的基本特点是外国资本控制本国银行，国际游资控制着汇率、利率。只要有风吹草动，游资心里一嘀咕，巴西人民就害大病。

2003年1月1日，在20万人的欢呼声和疯狂的桑巴舞中，只上过5年小学的车工卢拉正式宣誓就职。当时的他满含热泪地说：“如果在我任期内，巴西全体国民都能享用一日三餐，我将不负此生。”当时的巴西连遭受亚洲、俄罗斯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冲击，货币狂贬，股市暴跌，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外资纷纷撤离。而卢拉为民众打气说，一个像美国那么大的富饶国家，没有理由养不活约5000万生活在贫困中的巴西人，

这给巴西人重新燃起了希望。卢拉在第一任期内扭转了国家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通货膨胀率也逐年下降。3年多全国累计创造了463万个就业岗位，今年头8个月新增就业人数就超过120万。“家庭补助金”项目为1100万户家庭提供了小额资助，更多人受到教育，最低工资3年来显著增加，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增加25.3%，使4000万下层劳动者和退休人员受益。由于这些成果，3年来巴西贫困人口减少了19%，贫困人口下降的绝对数量超过前10年的总和。伟大吧？不伟大，因为卢拉并没有解决经济和社会根本问题。首先，卢拉虽然止住了经济持续下滑，但经济增长极度缓慢。4年中年均增长不过在2到3个百分点上下，而同期不要说东亚国家均为7~8个百分点增长，连拉美其他国家年均增长也超过4%（这些增长还不包括阿根廷，因为阿根廷同期也低于平均数，这些增长都是没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完成的，尤其像查韦斯这类左派国家）。政府一旦失去了对资金的控制和调配能力，也就失去了产业政策的制定能力和支持能力，能有什么作为？银行不给企业贷款，你就只能发行国债，而证券市场更是由西方金融资本控制。这还不说政府现根本没能力支付债务利息。截至2005年5月底的公共债务余额为9575.7亿雷亚尔，相当于同期GDP的50.3%，一天的利息付出竟高于政府年初至6月22日止共5.062亿雷亚尔的全部投资额。巴西经济学家据此认为，巴西仍不具备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缓解社会不公的必要条件。卢拉虽然把缓解贫富分化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手段匮乏。卢拉每年拨给贫困家庭的资金总计1100万美元，而每年腐败造成损失就有50亿美元。而这个政府各级办事官员都与西方资本有关，卢拉能做什么？卢拉连任总统后，贫富分化开始抬头，卢拉并没什么办法。巴西一直是世界贫富分化最严重国家之一，居住在山上的富豪与居住在山下的穷人，中间拉着很高的铁丝网，还有持枪武装人员守卫，穷人和富人之间甚至各自支持的球队都不同，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今年以来，巴西黑社会组织“首都第一司令部”在圣保罗州连续发动了3次袭击警察、平民和州政府办公地的“武装行动”，尤其是6月12日策划圣保罗州70多座监狱集体暴动，规模之大、气焰之嚣张令人震惊。卢拉在第一任期内对贫富分化有所矫正，但对于后两个“巴西病”仍束手无策。即使是依靠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猫腻手段抵抗西方金融控制的韩国也很难受。1997年金融危机，西方人正张开大嘴准备一举吞掉韩国民间金融时，韩国人发起了“捐卖黄金首饰”、“找出箱底的一块美元”等运动，筹资十几亿美元。但是金大中并不一定与老百姓真的一心。金采取了迂回手段，先是国家花费了1250亿美元将大部分银行国有化，然后命令负债沉重的国内企业2年内清除60%负债，结果大部分企业只能通过出售大量真实资产或吸纳新股东满足这一要求。于是西方数百亿美元流入韩国，2002年随着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人，韩国9家商业银行的6家被西方控制。《韩国时报》报道：外国控股的银行“不情愿向韩国企业发放贷款”。现代企业离开银行怎么活？不给你贷款你就死，半死不活情况最好，于是外国资本到2002年就以“清仓价”控制了韩国半导体的44%，通讯业的21%，并成为现代汽车、现代电子、LG以及三星电子的重要股东。而著名的大宇汽车就在这场人为的债务危机中消失了。当年韩国人在一无所有情况下，违反“国际分工”发展汽车行业。但是所有政界、商界、社会名流都带头只开本国车，虽然韩国没有限制日本车进口的政策，但韩国汽车工业总算站住脚了，而且成为亚洲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可就这么一个简单过程，韩国两大汽车集团一个不算了，一个被外资控股了。以后你看到的韩国车，只能是“美国在韩国制造”的汽车了。中国汽车确实本来就是“通用”或者“大众”“在中国制造”的汽车，可韩国人拼死拼活创造的民族汽车，从此与中国一样了。丧失金融控制权就这点好处^_^

贫道就不再举例子了，印尼，墨西哥，泰国等情况也一样。下面贫道就不说中国了，究竟中国金融“开放”到了什么状态，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美国人心里也有数。

以上文章都是从网上收集，需要查看原文，请使用搜索引擎通过文章题名查找！